

# 新中国 70 年的系统回顾与展望

——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

刘淑芳 杨虎涛\*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通过 70 年的发展，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惊人的增长奇迹，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内生产总值 1952—2018 年增长 174 倍，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7 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近 14 亿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sup>①</sup> 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大量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重点，对 70 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模式、内在动力、经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系统总结和阐述，不仅对多维度、多视角总结中国历史经验，而且对中国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按照不同的主题和视角，我们选取了代表性文献与观点进行分类总结。

## 一、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

### （一）新中国 70 年来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

对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主要有两种划分方法。

\* 刘淑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

① 《铸就新时代中国的更大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新华社社评，2019 年 9 月 30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30/c\\_1125059598.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30/c_1125059598.htm)。

第一种方法是以改革开放为划分节点，将新中国 70 年分成两个发展阶段。对新中国 70 年来的经济发展，较为普遍的划分方法是以改革开放为划分节点，将新中国 70 年分成两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和改革开放后的 40 年。前 30 年呈现数量驱动型超常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的 40 年，表现为新型加速赶超增长。<sup>①</sup> 但普遍认为，70 年是一个整体，两个阶段不可分割。如，卫兴华等指出，前 30 年的发展中虽然有失误，但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如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年均增长率达到 6.1%。而新中国 70 年的巨大进步需从两方面比较：纵向比和横向比；与旧中国、与新中国初期的发展情况相比较，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来分析。<sup>②</sup> 何自力等认为，前 30 年和后 40 年的一贯性在于，在新中国 70 年经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始终不变、坚持发展目标为实现现代化始终不变、强调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性始终不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不变，适时灵活地调整相应的制度与战略，体现了“变”与“不变”在经济现代化建设中的辩证关系。<sup>③</sup> 而从根本上说，70 年来，新中国的复兴本质上是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造就的。<sup>④</sup> 70 年来的成就体现了建国的目的——民富国强。<sup>⑤</sup>

第二种方法是根据我国 GDP 增长的变化轨迹，将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飞跃分成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社会主义改造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时期；十八大以来至今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sup>⑥</sup> 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速度和成就，人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是经济呈指数型“爆发式”高速增长时期；<sup>⑦</sup> 是用 40 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近 100 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中国奇迹”的时期。<sup>⑧</sup> 而党的十八大以后至今，则是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时期。<sup>⑨</sup>

① 王宏森、张平：《从工业化赶超到高质量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70 年》，《经济纵横》2019 年第 9 期。

② 卫兴华、田超伟：《社会主义实践 70 年的成就及两个阶段的正负经验》，《东南学术》2019 年第 5 期。

③ 王娜、何自力：《新中国 70 年经济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中的“变”与“不变”》，《经济纵横》2019 年第 10 期。

④ 李梦欣、任保平：《新中国 70 年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的演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 年第 5 期。

⑤ 林毅夫：《新中国成立 70 年和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解读》，《科学社会主义》2019 年第 3 期。

⑥ 武力：《新中国 70 年的经济发展和辉煌成就》，《史学月刊》2019 年第 9 期。

⑦ 任保平、张倩：《新中国 70 年经济增长轨迹及新时代转型路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⑧ 周文、刘少阳：《新中国 70 年成就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天府新论》2019 年第 6 期。

⑨ 隋福民：《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理论创新》，《新视野》2019 年第 4 期。

## （二）新中国 70 年来的经济发展逻辑

70 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遵循了一种怎样的逻辑？任保平认为，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逻辑是典型的转型发展：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向现代工业经济，经济发展的任务与经济转型的任务叠加在一起，不断借助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演进，构成了整个中国经济长期演进的逻辑。<sup>①</sup>从经济战略的角度而言，7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战略也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从短期战略向长期战略转型，更重视生态环境、重视可持续发展；从总量战略到结构战略转型，实现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赶超和追赶战略到质量效益战略转型，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sup>②</sup>

李钢认为，从较长期的历史尺度来看，无论是前 30 年还是后 40 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所实施的都是如何在既有国情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质都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探索一条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不断发展的国情、不断变化的世情的发展道路。中国能成功实现转型，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也源于中国传统的“求实”“重实”传统。强调包容、融合，愿意根据实际修正与调整理论。<sup>③</sup>简新华也指出，7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其中所蕴含的三重逻辑是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中国潜在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无法变成现实的“红利”，难以形成“有效市场”，更不会走上正确的改革开放道路、创造经济发展奇迹。<sup>④</sup>

## （三）新中国 70 年来的工农业发展

### 1. 新中国 70 年来产业结构的变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探索并实践了一条从传统农业国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中国道路。张辉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以重工业为主、以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为目标的初始阶段，到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依赖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阶段，

① 任保平：《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创新》，《学术月刊》2019 年第 8 期。

② 任保平、宋雪纯：《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及其转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③ 李钢：《新中国 70 年经济体制变革的统一逻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

④ 简新华：《7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重逻辑》，《人民论坛》2019 年第 10 期。

到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生产模式转换、三次产业的均衡发展的新阶段的发展历程。<sup>①</sup> 70 年发展，第一产业基础地位更趋巩固，比重在总量增长的基础上整体呈递减趋势；第二、三产业比重提升，逐渐成长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严重失衡到总体平衡的发展历程，农业、工业逐步迈向中高端，服务业成长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通过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协同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并且向合理化、高级化和服务化方向不断迈进，同时我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也稳步提高。<sup>②</sup>

其他的研究结论基本相似，但也有研究更侧重于历史进程对当下的启示意义。惠宁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工业主导地位不断提升，服务业对经济社会的支撑效应不断优化，三大产业发展趋于合理，变动趋势基本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但中国产业结构层次仍然较低，产业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要坚持从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创新驱动、绿色增长和改革开放五个方面推动一二三产业合理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sup>③</sup> 陈洪昭等人则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总体呈现出了高级化的演进趋势。近年来，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产业体系的健康发展。但仍存在服务业发展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走出去准备不足、未能有效对接开放需要等不足与问题，限制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sup>④</sup>

## 2. 新中国 70 年来的工业化道路

### (1) 工业化进程的时段划分

胡鞍钢根据世界工业化进程比较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历程。他认为，1953—1977 年属于 1.0 版的国家工业化、1978—1991 年是 2.0 版混合工业化、1992—2001 年是 3.0 版混合工业化、2002—2011 年是 4.0 版新型工业化和 2012 年至今属 5.0 版绿色智能工业化，这一系列变化使中国由工业化的后来者、落伍者走在时代的前列，并为南方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中国特色模板。<sup>⑤</sup> 关权则从发展战略、理念、路径和成就的角度将 1949 年以来中国工业 70 年的发展历程分成了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内

① 张辉：《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研究》，《新视野》2019 年第 4 期。

② 汪晓文、李明、张云晟：《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发展：70 年回顾与展望》，《经济问题》2019 年第 8 期。

③ 惠宁、刘鑫鑫：《新中国 70 年产业结构演进、政策调整及其经验启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④ 陈洪昭、李成宇：《新中国 70 年产业结构的演变与成效》，《经济研究参考》2019 年第 18 期。

⑤ 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道路 70 年：从落伍者到引领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 年第 5 期。

向粗放型和改革开放外向均衡型。<sup>①</sup> 贺俊等则从技术创新的视角理解中国工业化进程，将中国工业技术进步 70 年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949—1977 年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艰难起步阶段，1978—1991 年为开放中加快技术引进和吸收阶段，1992—2005 年为市场竞争推进形成正向设计能力阶段，2006 年以来为全球化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阶段。<sup>②</sup>

针对中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姚鹏等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1949 年 10 月到 1952 年为中部地区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阶段；1952 年到 1957 年为中部地区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初步建设阶段；1958 年到 1977 年为中部地区工业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79 年到 2011 年为中部地区工业经济的改革开放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sup>③</sup> 彭绍仲则将 70 年来新中国的轻工业发展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950—1952 年是轻工业、手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阶段；1953—1957 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和轻工业计划管理体制初步成型阶段；1957—1966 年是轻工业各级行业垂直型分级管理职能、机构健全、完善时期；1966—1976 年的是轻工业发展遭遇严重挫折的时期；1978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轻工业率先改革，结束产品匮乏状态；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轻工业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21 世纪前 10 年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轻工生产大国；2011 年以来，伴随轻工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我国向轻工强国迈进。<sup>④</sup>

## (2) 工业化进程的总结与展望

黄群慧认为，新中国 70 年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是将工业化的共性规律和中国的个性化国情有效融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重新构造了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基础上，预测我国将会在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在 2035 年全面实现工业化。<sup>⑤</sup> 史丹则认为，新中国将工业立国视为长期战略，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则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发展的每个阶段的理论探索和战略方针又都反过来指导中国工业发展战略，我国工业发展的未来重在高质量发展、

① 关权：《中国工业发展 70 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 年第 9 期。

② 贺俊、陶思宇：《创新体系与技术能力协同演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 70 年》，《经济纵横》2019 年第 10 期。

③ 姚鹏、张明志：《新中国 70 年中国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历程、成就、问题与对策》，《宏观质量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④ 彭绍仲：《新中国 70 年轻工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中国经贸导刊》2019 年第 18 期。

⑤ 黄群慧：《新中国 70 年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光明日报》2019 年 7 月 9 日。

产业融合、创新和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互动等方面。<sup>①</sup> 李晓华认为，我国之所以从一个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经验在于做好顶层规划与激发基层活力相结合、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比较优势与能力建设相结合、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sup>②</sup> 肖翔等则从大国视角出发，认为人口众多与多民族、国土面积大与资源分布不均衡、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不足等特殊国情，需要我国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而由于我国工业化具有赶超的特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优势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为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环境。<sup>③</sup>

也有学者对 70 年来工业化的贡献和结构特征变化进行了分析。从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的视角，李金华认为，在中国工业 70 年的发展中，虽然在不同发展阶段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力度不同，但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与 GDP 增长存在明显的同步性。<sup>④</sup> 邓洲等梳理了 70 年来工业结构特征变迁的历程，认为 70 年来工业的结构特征演变遵循了如下逻辑：轻重工业结构两轮优化调整、主导产业的行业结构多次更替、资本要素深化但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更高、高技术化趋势上升、从单一所有制结构到多元所有制结构发展、产业组织结构趋于合理化、地区结构从非均衡和梯度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认为工业结构变化应顺应工业化规律，结合不同阶段的国情世情，推进我国工业结构沿着工业强国的方向不断变迁。<sup>⑤</sup>

王钦认为，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工业技术创新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要坚持自主创新、坚持将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坚持市场配置技术创新资源的导向、坚持在全球范围整合技术创新资源，逐渐加快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提升技术创新体系的协同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亟需进一步完善，实现中国工业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sup>⑥</sup> 胡迟认为，虽然从产业规模与门类视角而言，我国制造业实现了跨越式成长并且成为全球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关键核心领域、产业结构形态、整体发展质量效益以及制造业的增

① 史丹：《中国工业 70 年发展与战略演进》，《经济日报》2019 年 10 月 9 日。

② 李晓华：《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历程与宝贵经验》，《经济日报》2019 年 10 月 30 日。

③ 肖翔、武力：《大国视角下新中国工业 70 年述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 年第 8 期。

④ 李金华：《新中国 70 年工业发展脉络、历史贡献及其经验启示》，《改革》2019 年第 4 期。

⑤ 邓洲、于畅：《新中国 70 年工业经济结构变迁》，《China Economist》2019 年第 4 期。

⑥ 王钦：《新中国工业技术创新 70 年：历程、经验与展望》，《中国发展观察》2019 年第 21 期。

加值率方面仍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sup>①</sup>

### 3. 新中国 70 年来农业农村的发展

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经营模式和农地制度变迁构成了 70 年来农业农村发展回顾总结的主要线索。根据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经营模式变化,董志勇等人梳理了新中国 70 年来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历程:1949—1952 年通过“农民所有,自主经营”的个体经营体制,解放了广大农民,实现了民族独立;1953—1978 年经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营体制,在农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79—2012 年的“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2013 年至今的完善基本经营制度,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阶段,推动了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推进了农业现代化。<sup>②</sup>赵军洁等则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改革历程的主线可以总结为农业经营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即农民土地所有制—人民公社化—双层经营体制—城乡一体化,围绕着“三个坚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sup>③</sup>周振等人则从制度变迁理论出发,将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概括为家庭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双层经营—多层经营的演变历程。“统”被定义为生产力要素从分散到集中,反之称为“分”,认为“统”与“分”结合得越好,农业生产效率越高。在市场与政府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后的农业发展中,应鼓励形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多类型的“统分结合”经营形式。<sup>④</sup>

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迁的因素是什么?蒋永穆等认为,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迁的两大因素分别为国家统筹和农民创造性实践。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经历了 1949—1956 年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时期;1957—1978 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1978—1993 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1993 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概括总结了始终坚持与农村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农户个体与集体组织的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坚持土地集体共同所有、坚持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尊重农民创造性实践成果基础上加强国家统筹规划的变迁经验。<sup>⑤</sup>同时,从发

① 胡迟:《以创新驱动打造我国制造业高质量成长——基于 70 年制造业发展回顾与现状的考察》,《经济纵横》2019 年第 10 期。

② 董志勇、李成明:《新中国 70 年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历程、基本经验与政策走向》,《改革》2019 年第 10 期。

③ 赵军洁、张建胜:《新中国 70 年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回顾和政策展望》,《经济纵横》2019 年第 8 期。

④ 周振、孔祥智:《新中国 70 年农业经营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政策启示》,《管理世界》2019 年第 10 期。

⑤ 蒋永穆、王运钊:《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迁及未来展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9 期。

展目标和战略的变化出发，蒋永穆等将新中国 70 年农业发展的动态历史演进过程总结为：1949—1978 年逻辑前提渐趋科学的探索阶段；1978—2002 年目标取向不断多元的形成阶段；2002—2012 年核心内容日臻完善的确立阶段和发展战略逐步成熟的深化阶段；2012 年至今整体把握我国“三农”问题的发展变化阶段。<sup>①</sup>

农地产权制度是土地的核心，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支撑。中国农地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56 年小农经济特征明显的农民土地私有制；1957 年—1977 年基本由中共中央和政府主导的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制；1978—2013 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两权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 2014 年至今的“三权分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探索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方向，更好地完成乡村振兴战略。<sup>②</sup> 孔祥智认为，中国农业所有制变迁沿着合作（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形式、集体（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形式的演变路径，通过合作经济的不断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并继续指导合作经济的实践，助力当代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成就了农民合作社大发展的显著时代。<sup>③</sup>

#### （四）新中国 70 年来的金融发展

王国刚将中国金融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 年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探索时期、1979—2017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设时期、2018 年至今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时期。<sup>④</sup> 巫云仙则从金融业制度变迁的视角，梳理了改革开放前中国金融业从封闭、传统、被动应对走向 1978 年后开放、现代和主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的曲折发展过程。<sup>⑤</sup>

银行业是唯一贯穿新中国 70 年发展的金融产业，王国刚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提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宝贵经验：始终不渝地坚持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从实际国情出发，坚持发挥国有银行的功能，适时推进银行业等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创新、依法加强对各类银行的全面监管。<sup>⑥</sup> 王国刚等人同时也对中国证券业

① 蒋永穆、卢洋、张晓磊：《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内涵演进特征探析》，《当代经济研究》2019 年第 8 期。

② 王成利：《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研究》，《经济问题》2019 年第 11 期。

③ 孔祥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合作经济研究》，《河北学刊》2019 年第 6 期。

④ 王国刚：《中国金融 70 年：简要历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 年第 7 期。

⑤ 巫云仙：《新中国金融业 70 年——基于制度变迁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 年第 4 期。

⑥ 王国刚：《中国银行业 70 年：简要历程、主要特点和历史经验》，《管理世界》2019 年第 7 期。

发展历程做了简要概括：1949—1979 年初步探索的波折发展时期，建立了证券交易所、发行了公债；1980—2016 年的快速发展时期，股票、国债、企业债相继发行，成立了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逐步进入一个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监管时代；2017 年至今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时期，加大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力度，设立科创板，实行注册制，守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sup>①</sup>

70 年来中国外汇市场的实践不仅体现着中国金融业的变化，也折射出中国经济开放度的变化。王国刚、林楠将中国外汇市场发展的历史分成 1949—1978 年艰难探索期、1978—2013 年的形成发展期和 2013 年至今的创新拓展期。但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历史演进视角，又分成 1949—1978 年行政定价的单一汇率体制阶段、1978—2005 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探索阶段和 2005 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推进阶段。<sup>②</sup> 理论和实践都显示，中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应当依托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适应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

#### （五）新中国 70 年来的城镇化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特殊性，结合政府规制城市化的现实状况，中国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城市化发展道路。<sup>③</sup>

新中国成立后的 70 年，中国城市化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城市经济在总量增长、结构优化、资源集聚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回顾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历程，以改革开放为转折点，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城市化率上升速度、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收入和消费）、城市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城市以医疗和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水平等在改革开放后都要远远大于之前，城市群已经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是今后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sup>④</sup>

我国城市经济政策几经变迁。新中国成立初期接管城市后，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恢复城市经济生产；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指令式的城市经济政策，经过摸索和实验，奠定了我国城市工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通过城市对外开放体系、城镇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城市经济政策激励了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世

① 王国刚、郑联盛：《中国证券业 70 年：历程、成就和经验》，《学术研究》2019 年第 9 期。

② 王国刚、林楠：《中国外汇市场 70 年：发展历程与主要经验》，《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 10 期。

③ 踪家峰、林宗建：《中国城市化 70 年的回顾与反思》，《经济问题》2019 年第 9 期。

④ 李天健：《中国城市经济发展 70 年：历史轨迹与特征化事实》，《经济学家》2019 年第 10 期。

纪之交，土地城市化推动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城市经济的影响更加明显；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的成熟，城市经济政策不断创新，推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sup>①</sup>

## （六）新中国 70 年来的扶贫道路

贫困问题是世界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减贫进程，以发展解放保护生产力为根本减贫手段，采取“减贫组合拳”综合治理贫困，顶层设计与具体举措相结合，开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相配套，构建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将消除贫困作为重要使命，全面主动减贫，实现 7 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成就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我国在消除饥饿与贫困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sup>②</sup>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扶贫的思想，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贯彻精准扶贫原则，精准的扶贫对象、措施方式、政策组合等的实施，体现了新中国 70 年扶贫工作在指导思想、扶贫理念以及行为方式上鲜明的中国特色。<sup>③</sup>

从阶段划分上，郝志景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扶贫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救济式扶贫阶段；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的体制改革扶贫、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以及深入扶贫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阶段。<sup>④</sup> 张平等认为新中国 70 年来的反贫困实践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三个发展阶段。<sup>⑤</sup> 就扶贫的动力和保障因素，孙咏梅等认为，中国的减贫成就的外在动力来自于高增长，内在动力来自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大规模扶贫开发提供了制度保障的优势。同时，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经济增长的收益分配非均衡特征表现突出，贫富分化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需要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利贫式经济增长”。<sup>⑥</sup> 张思锋等认为，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成功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

① 李天健、赵学军：《新中国 70 年城市经济政策变迁、历史贡献及其启示》，《改革》2019 年第 8 期。

② 蒋永穆、卢洋：《新中国 70 年的减贫事业》，《光明日报》2019 年 7 月 5 日。

③ 程承坪、邹迪：《新中国 70 年扶贫历程、特色、意义与挑战》，《当代经济管理》2019 年第 9 期。

④ 郝志景：《新中国 70 年的扶贫工作：历史演变、基本特征和前景展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 年第 5 期。

⑤ 邢中先、张平：《新中国 70 年来的反贫困实践：历程、经验和启示》，《财经科学》2019 年第 9 期。

⑥ 孙咏梅、秦蒙：《高速增长会自动消减贫困吗？——新中国成立 70 年取得的减贫效果评价》，《教学与研究》2019 年第 5 期。

供了制度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及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成果。<sup>①</sup> 王春蕊从扶贫对象、扶贫方式、参与主体以及机制保障的角度,总结了 70 年扶贫开发模式演进特点: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参与式脱贫,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积极性;以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模式推动贫困区内源式发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构筑“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齐抓共管的保障体系。<sup>②</sup> 而市场力量尤其是企业,在扶贫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新中国 70 年不同发展阶段,企业一直以多元化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贫困民众收入的改善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sup>③</sup>

新中国经过 70 年的不断努力,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总结了 70 年中国扶贫经验的世界意义,认为中国作为减贫成效最显著、探索扶贫经验突出的负责任大国,积累了大量扶贫减贫的治理经验,有很多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方案可供其他国家借鉴。同时,我国一贯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在致力于解决自身贫困问题的同时,始终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通过无偿援助、项目援建、低息贷款、培养人才等多种方式,帮助其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环境,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全球范围内扶贫减贫经验的交流分享,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经验。<sup>④</sup>

### (七) 新中国 70 年来对外开放的历程

70 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49—1978 年,这一时期属于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发展时期,外贸只是整个发展战略的有限补充;第二阶段是 1978—2001 年,开始走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注重增长、就业、出口等规模性目标;第三阶段是 2001—2012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发展阶段,开放倒逼改革,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中国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贡献者;第四阶段是 2012 年至今,国家努力使国内体制与全球化趋势更相适应,开放的内涵进一步升级,高质量发展要求更高质量的贸易与外资,通过建立开

① 张思锋、汤永刚、胡晗:《中国反贫困 70 年:制度保障、经济支持与社会政策》,《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② 王春蕊:《中国 70 年扶贫开发模式演进》,《经济论坛》2019 年第 10 期。

③ 李先军、黄速建:《新中国 70 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改革》2019 年第 7 期。

④ 侯波:《中国扶贫减贫事业 70 年:历史回顾、基本经验和世界意义》,《经济研究参考》2019 年第 9 期。

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sup>①</sup>

对外开放的直接表现体现在对外贸易的巨大成就上。7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地位和规模日益提升，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优化，外贸企业经营权得以强化，积极性与效率提高，吸引外商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形成了“引进来”和“走出去”齐头并进的新格局。<sup>②</sup> 外贸的巨大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逐步推进外贸管理体制变革，全面释放外贸发展活力；适时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主动加入 WTO，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增设各类开放型经济园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sup>③</sup> 而 70 年外贸体制机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可归结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积极对接国际规则，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鼓励发展加工贸易，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当前，中国外贸体制机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突破性制度创新推进阻力大、开放政策呈现碎片化，政策与产业发展不协调，法制建设滞后，法律体系不健全、制度性因素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影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市场主体待遇存在差异、国际经贸规则引领能力不强。<sup>④</sup>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70 年的历程可以分为 7 个阶段：1949—1957 年的恢复起步阶段，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贸易政策的确立阶段；1958—1977 年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贸易政策的演进阶段；1978—1991 年的改革探索阶段，开始兼顾进口保护和出口鼓励的开放贸易政策，确立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生产模式，对外贸易还没有真正完全与世界市场和全球体制接轨；1992—2000 年是开放突破阶段，比照国际规则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力量；2001—2007 年是全面深化阶段，由于履行入世承诺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货物贸易规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爆炸”式增长，但属于“以量取胜”的粗放型发展阶段；2008—2012 年是调整与转型阶段，金融危机冲击使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剧烈波动，采取了调高出口退税率、促进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激励措施恢复中国对外贸易；2013 年至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已经从以往的规模扩张转变为现今的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开放。<sup>⑤</sup>

① 张幼文：《70 年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与历史逻辑》，《世界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

② 黄汉民、孔令乾、鲁彦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外贸体制变迁：回顾与展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③ 曲维玺、赵新泉：《我国对外贸易 70 年变迁与未来发展》，《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9 年第 5 期。

④ 王拓：《新中国 70 年外贸体制机制改革经验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9 年第 9 期。

⑤ 盛斌、魏方：《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70 年：回顾与展望》，《财贸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有重要意义。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与国际接轨,对外贸易直接间接带来了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升,跨国文化的频繁互动为国内文化产业的迅速扩大提供了动力。<sup>①</sup> 张小宇等从实证的角度识别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长期均衡视角下,出口贸易对产出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贸易;在短期动态视角下,进口(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表现出逐渐增强(变弱)的拉动效应;在如 1978 年、2001 年和 2008 年的特殊时间点,出口(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表现出逐渐减弱(增加)的拉动效应。<sup>②</sup>

对外开放不仅促进了中国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增添了活力。2018 年,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量的 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加速器”;通过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开放成果能够更好地惠及全世界;能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能通过自身的扩大开放推动全球共同开放发展,增进世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包容性。<sup>③</sup>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仅 2019 年 1—7 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 52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79.7 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1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3 642 份,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并引领国际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sup>④</sup> 中国勇于承担大国责任和义务,引领南南合作进程,积极构筑“带路”“金砖”等广大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的平台,在提供资金、国际机制创新、发展经验等方面贡献了中国方案。<sup>⑤</sup>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作为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金融开放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1949—1977 年计划经济体制下是金融开放的萌芽阶段,主要是通过借鉴苏联的金融发展模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二,1978—1991 年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基础奠定阶段,体现为以平等互利为原则,有计划、有重点地渐进式开放金融;第三,1992—2000 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深入探索阶段,金融开放政策目标更加明确,政策体系更为健全;第四,2001 年至今,建立了与开放型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运行机制,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高质量的金

① 余振、王净宇:《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70 年的回顾与展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② 张小宇、刘永富、周锦岚:《70 年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③ 杨丹辉:《新中国 70 年对外贸易的成就、经验及影响》,《经济纵横》2019 年第 8 期。

④ 王鹏:《从苦力劳工到“一带一路”:海外华商与中国外贸 70 年》,《中国对外贸易》2019 年第 10 期。

⑤ 杨娜:《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参与南南合作的历程及其启示》,《教学与研究》2019 年第 9 期。

融开放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共同发展。<sup>①</sup> 就利用外资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曾通过向苏联举借外债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1959 年后新中国积极开辟国内市场，经济上实现了独立自主；1979—1991 年开启了新中国利用外资的新纪元；1992—2001 年引进外资速度大大超过对外投资；2001—2016 年开始从“引进来”为主向双向投资协同发展，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驾齐驱；2017 年以来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通过自贸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进一步带动了双向投资的发展。<sup>②</sup>

## 二、新中国 70 年来的制度变革

###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形成历程

2019 年，许多学者回顾了新中国 70 年我国所有制的发展历程并进行了系统总结。从所有制结构上看，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从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为主体—允许、肯定和鼓励除公有制之外的其他多种所有制发展—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过程。从结构数据上看，1953 年到 1956 年底进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主要任务是实现变多种所有制为公有制。1957 年，城镇个体劳动者占比已经下降到 3.2%，工业总产值上，国有工业占 53.8%，集体工业占 19%，公私合营工业占 26.3%。<sup>③</sup> 而到 1975 年，工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占 81.1%，集体经济占 18.9%，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经济占 56.8%，集体经济占 43%；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消失。<sup>④</sup> 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体、私营、外资和混合等经济成分从无到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但功能地位得到加强。从就业上看，从 1978 年到 2017 年，城镇就业方面，国有单位比重从 78.3% 下降到 14.3%，集体单位比重从 21.5% 下降到 1.0%，公有制经

<sup>①</sup> 郭威、司孟慧：《新中国 70 年金融开放的逻辑机理与经验启示：兼论中美贸易摩擦下的开放取向》，《世界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sup>②</sup> 赵蓓文、李丹：《从举借外债、吸收外资到双向投资：新中国 70 年“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与经验回顾》，《世界经济研究》2019 年第 8 期。

<sup>③</sup> 刘戒骄、王德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与展望》，《区域经济评论》2019 年第 5 期。

<sup>④</sup> 葛扬、尹紫翔：《70 年所有制改革：实践历程、理论基础与未来方向》，《经济纵横》2019 年第 10 期。

济下降了 84.5 个百分点。但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依然排第一位, 2017 年占比为 39.2%, 相比 1978 年下降了 31.4 个百分点。集体企业的资产总额占比降幅最大, 从 1978 年的 29.4% 降到 2017 年的 0.4%。就所有制结构变化来说, 已经有 5 种经济类型的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比超过 10%。<sup>①</sup>

根据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于树一等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萌芽阶段 (1949—1977 年)、形成阶段 (1978—1999 年)、发展阶段 (1999 年至今), 分别对应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sup>②</sup> 武力等认为, 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到公有制占绝对优势, 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变化与调整, 始终围绕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并很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当前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 都还有亟待完善的地方。在经济存量调整阶段以及未来发展布局和产业政策方面, 如何合理界定二者的经营范围, 化解其利益冲突, 并实现有效协作、优势互补, 共同完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任务, 是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关键。<sup>③</sup>

包炜杰、周文等比对历次党代会报告以及中央其他相关重要决议文件文本与同时期该领域 CNKI 中高频次被引论文和其他重要文献, 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研究的演进历程。1949—1978 年, 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问题、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等, 研究重点集中在基本制度方面; 1978—1992 年, 研究围绕“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具体经营机制展开, 研究重点集中在经营机制方面; 1992—1997 年, 研究重点集中在企业制度方面; 1997—2002 年, 研究重点集中在所有制结构方面; 2002—2012 年, 研究重点集中在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以及实现形式方面; 2012 年至今, 研究重点集中在实现形式方面。<sup>④</sup>

很多学者聚焦国有企业 70 年来的发展过程, 其研究成果也间接地体现了所有制结

① 刘戒骄、王德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与展望》,《区域经济评论》2019 年第 5 期。

② 于树一、李木子:《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 70 年: 理论共识与实践合力》,《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0 期。

③ 武力、李扬:《新中国 70 年的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 年第 5 期。

④ 包炜杰、周文:《新中国 70 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发展演进与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2019 年第 9 期。

构的变化。在 70 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 1949—1957 年的全面建立阶段、1957—1978 年的奠定新中国工业基础阶段、1978—2002 年的被推向市场及参与市场竞争阶段、2002 年至今的资本化进程加速及利润持续增长四个阶段，这一演变历程与新中国成立后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探索步调基本相同。国有企业支持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并支撑了国家工业体系、促进了国防工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了若干重要重大技术进步及创新突破、增强与提高了我国支柱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sup>①</sup> 历史地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快速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初现端倪；改革开放后，以放权让利为重点，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激活了国有企业的生命力。赵锦辉概括了国企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主要经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企成功的基石；从国家经济政治大局出发不断调整布局，是国企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要继续推进国企发展，坚持国企主导地位不动摇、做强做优做大国企，深入推进国企改革，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国有企业。<sup>②</sup>

荣兆梓等在分析新中国 70 年来经济增长的路径时指出，共产党领导加上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增长的动态路径。在经济增长中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劳动者能力、利益与权利，更多更快地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潜能，这种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统一，生产力提高与人的能力发展的相互促进，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资本在全部社会经济中具有关键地位和主导性质，国有资本代表劳动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也更容易形成和谐的劳资关系，创新发展与共享发展协同推进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共产党领导和公有制为主体共同作用可有效避免两极分化。<sup>③</sup>

戚聿东等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变迁中的共性，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断探索实践国有企业分类管理方式，搭建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框架，加速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以内部制度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市场化运作速度。而历史遗留问题、“政企不分”现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垄断行业改革等情况，还需要在未来的改革中不断解决完善。<sup>④</sup> 肖红军等基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

① 文宗瑜：《国有企业 70 年改革发展历程与趋势展望》，《经济纵横》2019 年第 6 期。

② 赵锦辉：《中国国有企业 70 年发展回顾与展望》，《山东社会科学》2019 年第 9 期。

③ 荣兆梓、李艳芬：《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增长 70 年》，《教学与研究》2019 年第 9 期。

④ 戚聿东、肖旭：《新中国 70 年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与未竟使命》，《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改革的整体进程，通过企业的组织形态、制度逻辑、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经济形态的变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呈现了国有企业与社会的嵌入与融合。<sup>①</sup>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是中国探索前行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缺乏发展资金、生产剩余不足、收入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内部储蓄实现物质资本积累、一系列战略和制度实施安排，坚持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维护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主权，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sup>②</sup>

武力等从经济史的视角细致地梳理了 70 年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过程以及这种变化的时代背景。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货币投机、囤积居奇、生产萎缩的严峻形势，政府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击投机资本，平息了通货膨胀，平衡财政收支和物资供求，使国民经济在 1950 年下半年得以恢复。1952 年 10 月，为确保“一五”计划顺利实施，开始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政府逐渐取代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而这种变化是与短期实现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建设这一战略目标相适应的，而计划经济体制使资源在确保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流向工业建设，使中国得以在短短 20 多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非教条式地追求计划经济体制，也并没有完全消除市场的作用，而是要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工业建设。改革开放后，则在理论认识上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阶段，最终于 1992 年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到 20 世纪末，中国已经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sup>③</sup>事实上，在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不同阶段均有明确的目标：在更大程度上、从制度上更好、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① 肖红军、阳镇：《新中国 70 年企业与社会关系演变：进程、逻辑与前景》，《改革》2019 年第 6 期。

② 侯永志、贾坤：《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之路》，《红旗文稿》2019 年第 17 期。

③ 武力、李扬：《新中国 70 年的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 年第 5 期。

市场经济体制。<sup>①</sup>

刘凤义认为，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经济建设成就巨大，关键就在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坚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了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动了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既能调动全体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又有利于调动各类要素主体的积极性；坚持共享发展理念、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sup>②</sup>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实践与探索，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 70 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也是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实践探索的过程。从实践历程看，政府与市场关系可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1949—1978 年的萌芽期，在政府指导下配置资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被严重弱化；第二个时期是 1978—1992 年的探索期，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第三个时期是 1992 年至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期，发挥政府作用，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尊重市场规律，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sup>③</sup>

逢锦聚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经过反复探索，我们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牢牢把握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关键。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需要把握两个关键：一个关键是妥善发挥政府的作用，担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任、提供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环境、秩序等保障，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干预；另一个关键是创造条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和公平性作用，塑造与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相适应的微观主体，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效率最大化。<sup>④</sup>

70 年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演变，但基本政治体制结构始终保持大体上的稳定，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央地之间“集权”与“放权”的循环往复、改革开放以后央地博弈的兴起、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央地关系的制度化和法

① 董洁：《70 年来经济体制的探索与启示》，《经济日报》2019 年 9 月 16 日。

② 刘凤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红旗文稿》2019 年第 20 期。

③ 黄寿峰：《新中国 70 年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国家治理》2019 年第 25 期。

④ 逢锦聚：《破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世界性难题》，《红旗文稿》2019 年第 18 期。

治化，最终形成了国家—社会—市场的三维权力结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阐释，不同阶段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呈现不同的特征、政府与经济体制变革的关系体现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央地关系的演进体现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并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逻辑。<sup>①</sup> 历史地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管理权限经历了集中与分散的多轮反复。如，“一五”计划时期，中央政府基本实行了集中统一管理的做法以确保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供应。1969 年，为加速地方工业发展，加快备战工作，经济管理权限再度下放。虽然存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但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则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20 世纪 80 年代，为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对地方实施放权让利的改革，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地方经济发展热情高涨，但造成了中央财力不足、对地方经济盲目扩张约束不力等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时期，主要是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进行。<sup>②</sup>

金刚、沈坤荣回溯了 7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认为经济增长经历的每一个重要时期，都有政府行为演变与增长动力转换的互相耦合。第一个时期是 1949—1978 年中央政府主导的土改与公有化，中国经济增长波动频繁但呈复苏状态；第二个时期是 1978—2012 年地方政府竞争下的改革开放与投资驱动，中国经济增速加快；第三个时期是 2012—2015 年政府让位于市场开启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经济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增长；第四个时期是 2015 年至今在五大发展理念下政府与市场协作，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sup>③</sup>

### （三）新中国 70 年来财税与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

#### 1. 新中国 70 年来财政体制的演变

新中国财政 70 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走过的历史道路看，财政建设发展的特殊性是财政发展道路必然受到初始目标和制度背景的根本约束，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财政实践内容更加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新中国财政发展的实践路径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探索性

① 李康：《新中国 70 年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央地关系的演进与变革》，《经济学家》2019 年第 10 期。

② 武力、李扬：《新中国 70 年的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 年第 5 期。

③ 金刚、沈坤荣：《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政府行为演变与增长动力转换》，《宏观质量研究》2019 年第 3 期。

特征。财政建设和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始终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个主线、始终坚持国家在财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考察，中国财政理论必须且应该与中国财政发展、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自身的理论特色。<sup>①</sup>

70 年来共和国财政发展与演进线索的基本脉络可以分为：1949—1978 年，财政以为国家计划提供支持为主要职责；1978—2012 年，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等一系列实践对我国财税体制进行了重新定位与完善；2012—2019 年，财税体制改革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一改革目标，使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步入了一个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以财政为主要体现的经济力（生产力）和国家统制力（强组织动员能力、强集权能力）二者的有效结合，更有助于大国崛起战略目标的实现。<sup>②</sup> 龚浩等则将新中国 70 年财政体制改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8 年计划经济体制的统收统支；1979—1993 年放权让利后的包干制；1994—2013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税制；2013 年至今深度调整的分税制。<sup>③</sup>

也有学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将新中国财政 70 年发展划分为如下九个阶段：1949—1952 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建立了新中国财政；1953—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逐步建立了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区域实施不同财税政策的财税制度体系；1958—1965 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时期，财税体制围绕计划经济体制进行适应性探索；1966—1977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新中国财税体制的频繁变动期；1978—1993 年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时期，下放财权和财力，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1994—1997 年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1998—2002 年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时期；2003—2012 年是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时期，以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核心的各项财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2012 年至今建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时期。<sup>④</sup>

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发展的核心是分级财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事权和财权大部分集中于中央，分级财政属于萌芽阶段；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

① 吕炜、靳继东：《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中国财政 70 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管理世界》2019 年第 9 期。

② 范建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共和国财政 70 年的中心线索》，《经济研究参考》2019 年第 13 期。

③ 龚浩、任致伟：《新中国 70 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历程、逻辑主线与核心问题》，《改革》2019 年第 5 期。

④ 高培勇：《新中国财税体制的演进历程、历史逻辑及时代潮流》，《光明日报》2019 年 9 月 24 日。

开始将“分级财政”作为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财政体制目标模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建设时期，分税制的实施开始将政府间财政关系各要素进行明确划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分级财政要求实现财政新的定位——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与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一起被纳入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载体，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向纵深发展。<sup>①</sup>

## 2. 新中国 70 年来税收体制的发展

税收是财政收入来源的一种重要形式。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时期，受“非税论”影响，税制不断简化，税收收入下降；改革开放后，实施了两步“利改税”，使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大幅提高；2012 年以来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幅度稳定。70 年来，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保证了财政的正常运行。<sup>②</sup> 从具体时间段上，1949—1978 年计划经济时期是淡化税收治理时期，税收主要体现为筹集财政收入；1978—1994 年，两步“利改税”让税收走向最前台，但“企业承包制”不利于税收合理发挥作用，而“税利分流”让税收治理回归本源；1994—2012 年是基于市场化改革的税收治理时期，分税制厘清了“税”和“利”之间的关系，税收的调节作用在经济治理中日益突出；2012 年至今是新时代的税收治理时期，税收充分展现了治理作用。随着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税收治理功效会更加有力。税收治理与国际接轨、提高我国税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sup>③</sup>

杨默如对中国税制改革 70 年的发展历程的划分则略有不同。他认为，1949—1957 年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新中国建立新税制的时期；1958—1977 年计划经济时期，税收作为政府重要收入来源和调控手段的职能较弱，税制极度简化；1978—1993 年改革开放起步时期，采取复合税制体系，建成了以流转税与所得税为双主体的财税支持系统；1994—2012 年开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制度改革；2012 年至今是属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税收征管体制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中国税制的改革目标是要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健全地方税体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推进税收征管体系现代化、推动建立国际

① 闫坤、于树一：《新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 70 年：分级财政从萌芽到兴盛》，《财贸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② 杨志勇：《新中国税收 70 年：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经济报告》2019 年第 5 期。

③ 陈少强、覃凤琴：《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税收治理逻辑》，《税务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税收新秩序。<sup>①</sup>

### 3. 新中国 70 年来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伴随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从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应急性救济—社会保障快速制度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保障整体变化和主要保障项目的制度变革过程，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不断实践优化、法制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体系。<sup>②</sup>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以苏联为借鉴对象，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单一主体承担责任模式；改革开放后，则参照欧美国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主张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体系。<sup>③</sup> 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经济体制的转型相辅相成，封闭的计划经济对应封闭型经济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与之适应的开放型经济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传统的社保制度伴随经济体制发展转型变化，逐步转变为适合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消费、储蓄、投资等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开放型经济下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sup>④</sup>

具体而言，中国的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险基金体系也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1949—1977 年，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覆盖城市所有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保险体系阶段；1978—1997 年，由传统的“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险”体制转型阶段；1998—2009 年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体系；2010—2019 年是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险基金体系全面发展、结构转型与基本稳定的时期，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险体系，推进了健康中国与福利中国的建设。<sup>⑤</sup> 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看，20 世纪 90 年代前，国家把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权力下放，通过基金收缴和管理实现局部整合；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不同行业间、不同所有制间的养老保险逐步统一为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形成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农民养老保险三种模式；进入 21 世纪以来，开始走向制度合并和体系整合阶段，将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将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收入低于一定程度或无固定收入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整合。70 年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从“效率优先兼顾

① 杨默如：《中国税制改革 70 年：回顾与展望》，《税务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②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 70 年发展（1949—2019）：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③ 华颖：《中国社会保障 70 年变迁的国际借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 年第 5 期。

④ 郑秉文、张笑丽：《中国社会保障 70 年：助推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China Economist》2019 年第 4 期。

⑤ 刘继同：《新中国 70 年社会保险基金体系的历史变迁及其政策建议》，《江苏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

公平”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变化；国家责任从有限到强化，从扩大覆盖面转向提高质量，达成了人民在养老保障领域的美好向往。<sup>①</sup>

#### （四）新中国 70 年来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庞明川认为，新中国 70 年宏观调控先后经历了从“计划管理”到“综合平衡”，再到“宏观调控”“总量调控”“总量+结构”调控，以及从“需求结构调整”到“需求+供给”的结构性调控五次大规模实践转型，形成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总量+结构”“需求+供给”的理论范式，为发展宏观调控理论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新时代宏观调控的总体格局是围绕适应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并服务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sup>②</sup>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涨和萧条，一直在积极—稳健—收紧之间变化叠加。改革开放前，财政货币政策均处于探索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政策处在被动调控状态；1979—1992 年属于市场经济探索阶段，财政货币政策在双积极—双紧缩—双积极间组合调控；1993—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是积极+从紧—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 1998—2004 年亚洲金融危机蔓延期采取了积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控；2005—2007 年世界经济危机前为从紧+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而 2008—2010 年世界经济危机蔓延期开始实施积极+适度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刺激经济发展；经济新常态以来的财政政策整体呈现积极状态、货币政策整体呈现稳健状态。<sup>③</sup>

杨志勇对新中国 70 年财政政策进行了回顾和经验总结：国家行为方式影响财政政策的实现；选择顺应财政规律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要促进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积极防范财政风险，理性对待财政赤字；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实施需要渠道充分的财力基础；充分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实时适当选择财政政策。<sup>④</sup>

何德旭等系统地回顾梳理了新中国 70 年来货币政策框架的历史变迁：第一个阶段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防治通货膨胀和确保金融稳定的政策；第二个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现金收支、信贷、信贷与财政物资之间的综合平衡政策；第三个阶段是计划与

① 贾丽萍：《中国养老保障 70 年：在整合中走向高质量》，《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 10 期。

② 庞明川：《新中国 70 年宏观调控的转型、创新与基本经验》，《财经问题研究》2019 年第 11 期。

③ 刘金全、张龙：《新中国 70 年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范式：总结与展望》，《财贸经济》2019 年第 9 期。

④ 杨志勇：《新中国财政政策 70 年：回顾与展望》，《财贸经济》2019 年第 9 期。

市场调节并存时期，维护物价稳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第四个阶段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保持货币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第五个阶段是 2013 年以来兼顾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就业、汇率、外汇储备、金融稳定和防风险、经济结构调整、促改革、惠民生等多个方面的政策。<sup>①</sup>

李稻葵则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视角，梳理了新中国 70 年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历程，如 20 世纪 90 年代清理企业“三角债”、2013 年以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对股市剧烈波动风险等。他将新中国 70 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经验总结为：及时监测和识别金融风险，并全力以赴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暴露出来的体制机制问题加以改革，采取综合措施、标本兼治，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完备性；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着力处理好社会稳定问题，维护经济主体的信心。<sup>②</sup>

### 三、新中国 70 年来发展的特征研究

#### （一）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诀窍？关键特征是什么？其持续性的保障是什么？在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发展型国家成为一个普遍的视域，如新发展型国家<sup>③</sup>、李斯特型发展型国家<sup>④</sup>、后李斯特主义发展型国家<sup>⑤</sup>、后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sup>⑥</sup>等。这些从发展型国家视域出发的中国研究，或者认为中国只是在再现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历史，或者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已构成了新的发展型国家。但也有学者指出，发展型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含义

① 何德旭、冯明：《新中国货币政策框架 70 年：变迁与转型》，《财贸经济》2019 年第 9 期。

② 李稻葵、陈大鹏、石锦建：《新中国 70 年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改革》2019 年第 5 期。

③ Trubek, D. M., Trubek, L., Coutinho, D., et al, “Developmental States and the Legal Order: Towards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Law”,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no 25 (Feb 2008), pp 2—105.

④ Breslin, S.,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 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87 (Jun 2011), pp 1 323—1 343.

⑤ Strange Gerard, “China’s Post-Listian Rise: Beyond Radical Globalisation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liberal Hegemony”, *New Political Economy*, no 16 (May 2011), pp 539—559.

⑥ Bolesta, A., “China as a Post-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 Explaining Chines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olitical Science, 2011.

精准的概念，其应用和拓展必须考虑到历史特定性和连续性。不仅国家主体的结构与能力特征以及构成这一结构与能力特征的政治文化传统基础，而且在内外部初始约束条件及相应的选择集合上，中国都与东亚典型发展型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在发展战略、路径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上也有所不同，从而使中国在发展模式上有着比传统发展型国家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意蕴。<sup>①</sup>

陈先达以为，中国道路的提法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意。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说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学习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但是中国不会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来的。中国道路是实践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中国方案就存在于中国道路之中。中国道路，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之路，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之路。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必经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sup>②</sup>

“中国道路”的本质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标识是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中国道路”的时代特色是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创造的“中国故事”。<sup>③</sup> 张明认为，从本质上来说，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探索。从广义层面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整体性历史，都可以纳入中国道路的讨论域之中；从狭义层面而言，中国道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中国道路关涉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构筑出一条既坚守经典理论的本质规定性，又彰显本国具体实际，更区别于他国模式的科学发展道路。他对中国道路进行了如下的历史分期：1949—1978 年是着力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阶段；1978—2012 年是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阶段；2012 年至今是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的阶段。<sup>④</sup>

中国模式的本质是什么？本质上，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坚持共同富裕目标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法治社会。中国模式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途径，

① 杨虎涛：《发展型国家视域下的中国镜像》，《南国学术》2018 年第 2 期。

② 陈先达：《中国为什么要走“中国道路”》，《中华读书报》2019 年 11 月 27 日。

③ 张占斌：《“中国道路”探索与新中国七十年成就》，《中共党史研究》2019 年第 9 期。

④ 张明：《中国道路 70 年：内涵、视角与方法》，《人文杂志》2019 年第 10 年。

不但能与市场经济兼容还能够创造出巨大效率；中国模式也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开放的体系；中国模式也意味着，社会主义需要政治民主和建设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具有制度优势和高效的国家治理机制。<sup>①</sup>

“中国道路”成功的真正密码是什么？张占斌认为，密码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驾驭现代化发展的领导能力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和在实践中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对内奋发图强改革搞活，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在对外开放合作中虚心学习，努力处理好国际经济关系；坚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决捍卫“两个毫不动摇”；顶层设计精选符合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现代化战略和鼓励地方基层有序开展渐进式改革探索；坚持群众路线和走先富帮后富的共同富裕道路。<sup>②</sup>

## （二）新中国 70 年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70 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实践的过程。从思想发展和实践进程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毛泽东同志提出，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结合；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则根据新形势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提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sup>③</sup> 顾海良认为我国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和变革，既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蕴含了从“第二次结合”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sup>④</sup>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称为第一次伟大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称为第二次伟大结合，两者分别对应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① 何玉长、潘超：《试论中国模式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振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② 张占斌：《“中国道路”成功的真正密码》，《人民论坛》2019 年第 13 期。

③ 徐光春：《指引新中国创造发展奇迹——新中国成立 70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人民日报》2019 年 7 月 17 日。

④ 顾海良：《新中国 70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和历史主题》，《红旗文稿》2019 年第 21 期。

的第一次飞跃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次飞跃。<sup>①</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sup>②</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来源于新中国 70 年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基本前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确立、发展和完善，重要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彰显和发挥，坚实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质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sup>③</sup> 苗勃然等认为，70 年来，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连续的、完整的。新中国前 30 年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 40 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科技基础、人才基础并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后 40 年是对前 30 年的继承与发展，两个时期不同的侧重点与历史任务存在内在的逻辑统一性，每一个时期都以上一时期为基础向前推进。<sup>④</sup>

### （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

作为一个规模上“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一块大陆，是一种次全球体系”的经济体而言，70 年来解决发展中的区域递进、地区联动和不平衡也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sup>⑤</sup> 从人均 GDP 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的比值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过程考察，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省际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从反映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泰尔指数来看，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呈现“扩大—缩小”的波动变化并不断趋于缩小的特征。<sup>⑥</sup>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

作为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区域发展一直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 1949—1952 年的三年恢复时期，1953—1962 年实施重点支持内陆、兼顾沿海地区的均衡发展时期，1963—1978 年开启以“备战、备荒、为人民”为战略核心，牺牲沿海地区发展、支持内陆地区生产力布局的“三线”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梯度理论、点轴开

① 王伟光：《新中国七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启示》，《白银日报》2019 年 9 月 28 日。

② 孙蚌珠：《70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和根本成就》，《人民论坛》2019 年第 8 期。

③ 肖贵清、贾绘泽：《新中国 70 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 年第 9 期。

④ 苗勃然、周文：《正确认识新中国 70 年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兼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 年第 5 期。

⑤ 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

⑥ 陈伟雄、杨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70 年演进的历程及其走向》，《区域经济评论》2019 年第 5 期。

发理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sup>①</sup> 也有学者总结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追求区域均衡并形成了高度垂直的区域分工结构，强调区域发展自成体系的均衡发展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后以“梯度发展理论”为核心，以东部率先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非均衡发展，以及统筹四大板块、实施三大战略融合的协调发展三个阶段。<sup>②</sup>

王曙光等认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路径与中国经济从平等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历史性转变是相匹配的。<sup>③</sup> 也有学者认为，在不同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合作模式及政策也在不断演变，但我国区域经济的主流思想一直是区域平衡发展思想。蒋永穆等总结了中国区域合作演进 70 年的基本经验：围绕不同阶段国家建设的主要矛盾推动区域合作；科学处理政府制度供给与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融合；从空间强制倾斜到区域间良性互动；“公平与效率”不同维度组合下从非均衡至动态均衡的结构性变迁；区域合作有序化发展的法律规制问题。<sup>④</sup>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根植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正是在中国经济的大逻辑框架下动态演化的结果。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明确的国家战略形成制度变迁，进而推动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落实。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的空间增长动力不足，传统增长方式难以持续；区域经济格局分化加大，南北区域差距显现；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问题突出，空间要素流动受限；资源承载力不足，资源环境的约束矛盾日益加剧；城镇化发展速度过快，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性萎缩并存；区域开放程度差异较大，区域开放布局与开放质量亟需提升。<sup>⑤</sup> 陆铭等人以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为背景，认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存在经济总量差距、地区按比较优势分工是正常的情况，而区域政策也应该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获得平衡发展，开启区域发

① 吴振明：《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70 年回顾》，《经济研究参考》2019 年第 15 期。

② 石碧华：《区域经济发展 70 年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2019 年 10 月 17 日。

③ 王曙光、王丹莉：《新中国 70 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变革与新时代系统动态均衡格局》，《经济体制改革》2019 年第 4 期。

④ 蒋永穆、周宇晗、鲜阳红：《国内区域合作演进 70 年：历史进程、演进动力与基本经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5 期。

⑤ 刘秉镰、边杨、周密、朱俊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70 年回顾及未来展望》，《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 9 期。

展与平衡的新时代。<sup>①</sup>

## 四、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经济理论探索

### (一) 70 年来的中国实践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源泉和基石

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始自 20 世纪初期，初期基本上模仿西方大学经济学的教育体系。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又偏向于苏联。独立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程，可以说是在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才真正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和历史相比，中国现在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有一个好的条件：既有鲜活的问题和强烈的理论需求，也有以往所不具备的理论的自觉和探索的自信。<sup>②</sup>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70 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始终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在总结历史经验、回应时代主题、探索未来发展中不断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70 年来基于实践的探索书写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它贯穿于 70 年经济体制演进和经济研究的全过程，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主线。<sup>③</sup>

张卓元在《新中国经济学研究 70 年》中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是理论经济学的八大进展：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所有制理论有重大突破；分配理论有重大创新；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不断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梁八柱”；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sup>④</sup>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而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都能够相

<sup>①</sup> 陆铭、李鹏飞、钟辉勇：《发展与平衡的新时代——新中国 70 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管理世界》2019 年第 10 期。

<sup>②</sup> 刘伟：《中国经济学 70 年演进与发展》，《学习与探索》2019 年第 8 期。

<sup>③</sup> 谢伏瞻：《新中国 70 年经济与经济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0 期。

<sup>④</sup> 张卓元主编：《新中国经济学研究 70 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结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经济科学，是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总体而言，从曲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立，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局面，再到不断丰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三次飞跃。<sup>①</sup>

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大国崛起不仅要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要在经济理论上做出原创性的重大贡献：既要总结归纳提炼出一些基本的原理，还原经济现象的真实面目，又要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实现经世济民的目标。<sup>②</sup> 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和实践历程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有着鲜活而持久的生命力，也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参照对象。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时屡屡失败，原因就是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异是条件不同的内生结果。而中国过去 70 年的发展历程是理论创新的金矿，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能够比较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和我国一样的繁荣富足的目标。<sup>③</sup>

立足实践不仅是过去 70 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石，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和生命力的源泉。70 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国经济学在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方面涌现出大量优秀研究成果。从“苏联范式”起步，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家们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范畴，架构出经济学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推动了我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而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发展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又反馈于理论。新中国 70 年的实践经验为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理论储备，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还会迎来更多的繁荣期。<sup>④</sup> 在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的同时，中国经济学也正面临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更广泛地吸收有益知识体系和现代分析方法、更紧密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注重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有效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精准地揭示经济现象及所存在问题的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才能更好地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sup>⑤</sup>

① 张卓元：《新中国 70 年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新视野》2019 年第 5 期。

② 刘俏、李志军、张建华、郑红亮、洪俊杰、姚洋、刘守英：《“中国经济学 70 年演进与发展”笔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③ 林毅夫：《新中国 70 年发展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宏观质量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④ 史晋川、叶建亮：《新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 70 年》，《人民日报》2019 年 4 月 8 日。

⑤ 史晋川、叶建亮：《中国经济学 70 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研究参考》2019 年第 7 期。

##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 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 科学解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性质规律, 指导了中国市场化体制转轨、现代化社会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sup>①</sup>

70 年的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的语境中, 政治经济学早已不是一门简单的学科门类。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经验的全面总结, 远远超越了学科建设的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对 70 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和升华, 又是中国气派经济学的充分呈现, 作为对新时代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回应, 还将指导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在建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 要尽快改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落后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状况。<sup>②</sup>

顾海良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1949—1956 年开创的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期; 1956—1976 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和发展时期; 1976—2012 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蓬勃发展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展和探寻“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阶段时期。<sup>③</sup> 第一和第二个时期, 是“站起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第三个时期是“富起来”的政治经济学, 十八大以来是以“强起来”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四个阶段里有五个最主要的问题: 第一, 特定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二, 学理依循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三, 与时俱进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第四, 学术特征是守正创新; 第五, 科学体系就是建立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四个阶段中, 贯穿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是

<sup>①</sup> 于金富、任达:《新中国 70 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探索与创新发展》,《当代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0 期。

<sup>②</sup> 张晓晶:《70 年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基础》, [http://ex.cssn.cn/zx/bwyc/201908/t20190829\\_4963910.shtml?COLLCC=2134182733&。](http://ex.cssn.cn/zx/bwyc/201908/t20190829_4963910.shtml?COLLCC=2134182733&。)

<sup>③</sup> 顾海良:《从“第二次结合”到“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中国 70 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论略》,《学习与探索》2019 年第 8 期。

主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成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大课题，更是我们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导性问题。<sup>①</sup>

何自力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总结了其理论特点：紧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方法论；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理论研究的根本立场；坚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坚持以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sup>②</sup>

王立胜则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有学者提出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线。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为理论核心，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和最终目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辩证关系。<sup>③</sup> 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张林认为，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集各方面学术力量协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离不开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支持。<sup>④</sup> 黄少安则提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已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的知识积累基础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炼出基本方法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和经济发展的故事放在以“合作”为主线的经济学框架里，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体系。<sup>⑤</sup>

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任保平等认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每一次重大理论突破都会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进展，这也为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基础。<sup>⑥</sup>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实践推动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又促进了

① 顾海良：《新中国 70 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论略》，《社会科学文摘》2019 年第 12 期。

② 何自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2019 年 9 月 19 日。

③ 王立胜：《重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新中国 70 年的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 8 期。

④ 张林：《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光明日报》2019 年 6 月 18 日。

⑤ 黄少安：《新中国政治经济学 70 年回顾与展望》，人民网，2019 年 8 月 28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828/c40531-31321635.html>。

⑥ 任保平、张倩：《新中国成立 70 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阐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发展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以及通过二元工业化的特殊路径，实现了经济发展路径理论的创新；第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实现了市场动力与政府动力的结合，促进了经济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第三，从粗放型经济发展向集约型经济发展的转型以及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转变发展方式，再到创新发展，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第四，产业结构呈现出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再向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变化以及协调发展理念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第五，从人与自然的冲突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型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形成了包括生态财富在内的多维度财富观的创新；第六，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型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落实，体现了发展目标理论的创新；第七，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以及对高质量发展的追求，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创新；第八，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以及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开放发展理论的创新。<sup>①</sup>

---

① 任保平：《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的逻辑及创新》，《智慧中国》2019 年第 11 期。